

妇女·疯狂·英国文化

(1830~1980)

[美]艾莱恩·肖瓦尔特 著

陈晓兰 杨剑锋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

责任编辑 王永强
封面设计 张友乾

妇女·疯狂·英国文化

妇女·疯狂· 英国文化

1830~1980

[美] 艾莱恩·肖瓦尔特 著
陈晓兰 杨剑锋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ISBN7-311-01392-5/C·23 定价: 11.20 元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

妇女·疯狂·英国文化

(1830~1980)

[美]艾莱恩·肖瓦尔特 著
陈晓兰 杨剑锋 译

妇女·疯狂·英国文化

(1830~1980)

[美]艾莱恩·肖瓦尔特 著

陈晓兰 杨剑锋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308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甘肃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625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211千字 印数:1—2000册

ISBN7-311-01392-5/G·23 定价:11.20元

译者前言

艾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教授,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涉猎范围广泛,包括维多利亚小说、美国小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妇女研究、英国医学史等,著述丰富。著有《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多丽丝·莱辛》、《新女权主义批评》、《混乱的性别》、《姐妹的选择:美国妇女写作中的传统与变革》、《论性别》、《弗洛伊德之后的歇斯底里》、《妇女·疯狂·英国文化(1830—1980)》等。

肖瓦尔特是美国最具权威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她代表了欧美主要的女权主义批评倾向。肖瓦尔特兼容西方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及20世纪的批评理论与方法,既从社会、历史、文化的广度研究妇女的处境,又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探究女性的心理层面。在对女性作家的研究中,她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并列,考察了父权文化及文学语境中的女性处境及女性的创作,将女作家的创作划分为“模仿”、“女权主义”和“女人气”三个发展阶段。她提出了“女权主义阅读”和“女性中心批评”的概念,某种意义上说,表明了女权主义批评的倾向、研究的主题和目标。

在中国,肖瓦尔特同样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极具权威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其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妇女研究有着重要的、普遍的影响。《她们自己的文学》《新女权主义批评》及论文《荒野中的女权主义批评》、《妇女的时间、妇女的空间:书写女权主义批评的历史》、《自治与同化: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等,为中国女性研究者和文学批评者熟知并经常引用,成为评介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及研究的依据。

在西方文化中,男人是理性的化身,而女性则是非理性的代名词,她们自制力的缺乏使她们趋于疯狂。在西方文化的诸种文本,如文学作品、评论,医学、心理学教材,绘画及摄影中,疯狂具有着

双重意象,它是妇女的一种缺陷,又是妇女的一种本质,妇女与疯狂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切断的关系。妇女与疯狂的文化关联性无处不在。而在现实生活中,妇女也一直是精神病院内、院外的主要病人,以致使人们把疯狂、歇斯底里、神经衰弱看作妇女病。然而,直到十九世纪,妇女与疯狂的关系或者说疯女人才成为研究的对象,但它的研究者是以男性为主体的。在这里,男与女的关系变成了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疯狂是妇女处境的产物还是妇女的本质?疯女人是男性幻想、迷恋的对象还是一种假设、一个谎言?亦或疯女人、女性的疯狂正是偏见、假设和谎言的产儿?

《妇女、疯狂与英国文化(1830—1980)》是一部材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它既是一部女权主义视野中的疯狂史,研究了英国两百年妇女疯狂的历史,超越了以往“疯狂”研究中的男性视点和无性别局限;又是一部视疯狂为“妇女病”或“妇女本质”的文化史,超越了心理学、医学的界限,涉猎了医学杂志、心理学课本、疯人院记录、议会法案、疯人院建筑以及小说、诗歌、戏剧表演、绘画、雕塑、摄影等等有关疯狂、疯女人的材料来源,它又称得上是一部社会学著作、文学艺术批评著作。肖瓦尔特认为,为了弥补疯狂史研究中遗失的性别分析和女权主义精神,必须求助于以往疯狂科学及疯狂研究所忽略不提的文化根源,从研究疯狂的角度,重新挖掘妇女的叙述,如日记、回忆录和小说,从19世纪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玛丽·班恩斯到20世纪的沃吉尼亚·伍尔夫、夏绿蒂·帕尔金斯·吉尔曼、席尔维亚·普拉斯,这为进一步了解、研究妇女处境及女性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肖瓦尔特研究了19至20世纪英国父权文化的惯例、性别偏见、社会传统与精神学心理学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和疯狂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在英国父权文化体系中女性疯狂的真相。批判了一种亘古至今十分流行的偏见:即女性的疯狂、精神和心理的不健康

是女性的性别构造与女性本质的必然产物。肖瓦尔特通过文学、文化、心理学、医学、生物学等方面的实证研究,从女权主义的立场,分析了将女性与疯狂联系起来的社会、文化机制,这种机制通过医学、生物学科学的所谓客观性、科学性、实证性所证实。揭露了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中,英国父权文化不仅使女性趋于疯狂,而且也使男性发疯的真相。19世纪疯女人数量的急剧膨胀,20世纪战争中男性的精神崩溃与弹震症、乃至“疯狂英国”的“桂冠”,都是英国父权文化之性别偏见、文化惯例和理想人格对人性极度压抑的产物。

肖尔瓦特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民族语境——英格兰,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在英国有着一种经久不衰、连续不断的“疯狂英国”的文化观念。长期以来,英国被看作是一个全球性的疯狂大本营。18世纪以来,“英国病”与诸如商业、文化、气候、烹调这些民族体验诸方面的联系,一直就是科学论文和文学创作、艺术构思的主题。英国比她的任何一个邻国都拥有更多的“疯狂之歌”(mad—song)。19世纪疯女人成了女小说家文本中无处不在的人物,成为男性作家浪漫的幻想和迷恋的对象。18、9世纪的小说把疯女人描绘成性爱和色情的牺牲品,一种引起伤感的对象。年青美丽的女疯子那诗意的、艺术化了的、戏剧性的形象代替了先前令人不安的、狂野、黝黑、裸体的男性形象。莎士比亚的奥菲莉亚成了各个时代疯女人的象征,她的言语的隐喻特征及性意味,表现了古典式的爱情忧郁症。奥菲莉亚不仅是令男性着迷的形象,她所蕴含的女性、性爱与疯狂的关系成为后世男性作品中疯女人的原型,而且也是疯人院中女人模仿的样板,是精神病院管理人员和医生心目中疯女人的标准。19世纪精神病院试图把疯女人驯化为奥菲莉亚式的疯子:女性气、色情、柔弱、浪漫。当一名演员为演疯女人而去精神病院体验生活时,发现她们是演员,而不是真正的疯子。1733年,乔治·切尼的《英国病》一书,把疯狂看作是英国感伤、野心和知识的副产品。他希望读者应为他们民族遗产的一部分——阴郁、疑病症和坏

脾气而自豪,因为这些神经质的苦恼是进步和文化优越性的标志。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艺术、文学、科技、贸易方面早已成绩卓著,在疯狂方面也居世界领先地位。不论是英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认为,作为最富庶、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的精神病率也必然最高。毕竟疯狂是高度文明,高度工业化的社会疾病。有谁会在野蛮人中间,在奴隶身上,在未开垦地区的农民身上发现这种病呢? 1247年,英国巴塞勒姆精神病院建成,它成了所有疯人院的象征,它在精神病院的历史上有着难以想象的地位。19世纪向人们开放的科尔尼·海切疯人院象水晶宫一样,是一个现代奇观,是英国进步、人道主义和技术的象征。其“规模、先进性和容量”在英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1954年英国精神病院的数量高达14800所,精神病人的比率是33.45%,精神病成了一种象征性的疾病。英国的疯子人数居世界领先地位,而妇女则是英国精神病人中的多数。一家精神病院,或者说一种疾病,居然成为一个民族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成为精神病大全,无不具有讽刺意味。科技的进步、工业化的文明竟然与人的幸福健康是如此对立。

然而,英国对男女疯狂之病因的看法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英国的医学和传统的观念都把男人的疯狂归因于社会,男性的疯狂是工业化、文明进步的标志;而女人的疯狂则是女性的本质,是女性本质的缺陷。如果说,竞争、奋斗的刺激助长了男人的坏脾气,致使他们发了疯,那么,女人的身体构造注定女人比男人更易于走向疯狂。19世纪的许多精神病专家都著述证明这一假定的合理性。女性精神病的理论明显地把女性的精神疾病与女性的生命周期和生理构造联系在一起。她们再生系统的不稳定性关系到女性对性、情感和理性的控制。大脑与子宫之间,女性生育系统与神经系统之间的联系是那样紧密,以至于维多利亚精神病专家对妇女的治疗任务就是维持其大脑的稳定性,以对付势不可挡的身体变化。人们认为不加控制的性欲是女精神病患者最主要的症

状。因此对她们的治疗首先是控制周期性的生理变化和性特征,经过手术根除女性的性欲,其次是使病人养成勤勉的特征,避免一切引起欲望的活动,比如,不看小说,不吃肉食等。

达尔文的进化论又从另一方面为这种观念提供了依据。达尔文在《男人的遗传》中,十分肯定地界定了两性智力的天然差异,他说:通过自然选择,男人在勇气、能力、智力和创造天才方面都高于妇女,因此,他们必然在艺术、哲学和科学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才能。赫伯特·斯宾塞进一步证明了达尔文的论点:人类的发展依赖于一种固定的能量的消耗,因为妇女在生育过程中耗尽了或者说牺牲了她们的能量,致使她们在智力的竞争和发展中,受到严重的阻碍和抑制。当女人反抗她们的“本质”试图与男人竞争而不是为他们服务,或者追求母性功能之外的其它东西时,神经就会错乱。一旦得了这种病,就会传给下一代女性,还有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当时最具权威的医生莫兹利在论文《思想和教育中的性别》中指出:对少女进行智力训练会对他们的生殖系统和大脑造成永久的损伤。人的体能是固定的,用在这一方面的多,留给另一方面的就少,妇女在智力方面投入过多的能量,有可能引起严重的精神错乱,由于过度耗费脑力,她们的月经功能可能会失调,出现类疼、乏力、神经衰弱,甚至会导致舞蹈病、精神崩溃、生育能力退化,或者干脆不生育。一些女孩子为了考试死记硬背,结果导致了大脑的枯竭。竞争的刺激会给那些神经中枢本来就不稳定的女孩子造成巨大的不安和疾病,导致疯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家和医生的观点,以及世俗的先入之见“制造”了大批的疯女人,19世纪30年代,圣·路德精神病院就是在假定疯女人总是超过疯男人的基础上对病院宿舍进行了改造。在整个19世纪,更多的医院病房是为女人设计的,更多的私人医院只收女病人。正如一位医生安德鲁·斯卡尔所说,疯人院这类地方的作用在于有权选择监禁无助的、好惹麻烦的或贫穷家庭的成员,给她们提供一个实际的地方可

以代替家庭,于是,它们便鼓励人们将一些不相干的病人送进疯人院。

维多利亚时代重新界定了“疯狂”一词,它不仅指理智的丧失,而且包括不可接受的、对社会行为的背离。疯狂是自然情感、行为癖性、脾气、习惯、精神气质和自然冲动的病态的倒错现象,这一定义被引申,用以表示所有被认为不正常的或是不合社会标准的行为。不仅精神错乱,而且狂躁、痴呆、忧郁这些属于疯狂范畴的疾病,都可能会由精神原因引起。因为,强烈的情感和心理负担可能削弱身体系统的功能,从而失去了对精神紊乱的抵制力,因此,如果人们恰当地、随时运用意志力抵抗精神紊乱,避免放纵,精神病就可以防止。于是,维多利亚精神病学发明了对精神病的驯化方式,一方面它致力于驯服野性的疯子,进一步将疯狂同化,另一方面,将疯狂纳入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的轨道上来,在驯化的意义上重建治疗体系。公立精神病院的组织结构以家庭为模式,医务总管和他的妻子扮演着父母的角色,服务人员是哥哥、姐姐,病人则是孩子。精神病院与幼儿园、儿童学校十分相似,病人就像孩子一样,一种纪律、慈爱与威严的混和物,维持着一个家庭的秩序。

然而,女性发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女作家的日记、小说、处于边缘地位的女医生、心理学家的材料都表明:正是父权家庭中女性的处境导致了他们的疯狂。肖瓦尔特认为:要发现关于精神病的女性视角,我们必须求助于妇女的日记和小说。虽然这种文学只涉及到中产阶级和贵族妇女的经验,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夏绿蒂·勃朗特、伍尔夫、普拉斯的小说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女性生活的层面。她们把女性的精神疾病归因于缺乏有意义的工作、生活的无目的、没有希望和孤独处境,正是这一切导致了她们精神的抑郁和挫伤。她们无所事事地耗费着无望的生命,往往以顽固的疾病、疑症病或真正的疯狂结束其生命。

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也发现,那种重复循环的家庭琐事,是对

聪明女性的束缚和折磨,这正是歇斯底里的原因。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研究了19世纪的女性危机,疯女人形象在19世纪女作家的文本中无处不在,她们是女作家对父权传统之反叛的象征性表现。疯女人是作者的双重性,是她焦虑与愤怒的压抑,正是通过这种表现,女作家实现了她逃离男性之家和男性文本的愤怒的欲望,那些遭受着更深的精神创伤的天才妇女的日记和书信向我们表明:疯狂正是女艺术家在男人统治的文化中为实现其创造性而付出的代价。

父权文化给那些叛逆者贴上了歇斯底里和精神病的标签。医生们认为特别具有反叛性的年青妇女更易于得歇斯底里,“与正常的女性相比,歇斯底里病人过分自信更加独立,更为专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力量、个性果断、不屈不挠、不畏艰难。因此不同寻常的女性——艺术家、作家占了大多数。同样,那些致力于职业独立和性别自由的妇女被指责为歇斯底里、堕落退化,那些向妇女行为规范挑战的激进妇女被关进了疯人院。英国的精神病专家把对家庭生活的反抗看作是病态的。

英国父权文化不仅给叛逆的女性贴上了“歇斯底里”的标签,而且也将叛逆的男性送进了疯人院。英国父权文化不仅导致了疯女人的膨胀,而且也使男性走向疯狂。

在两次大战中,男性弹震症患者有如维多利亚时期的疯女人一样多,战时二十多所医院为他们进行治疗。军队医院无法容纳,便将地方民用医院改为临时军用医院,它传染迅速。士兵们焦虑、软弱、不适应、麻痹、作恶梦、恐惧、神经衰弱、失明失聪,这一切都与英雄的幻想及男子汉的梦想完全相悖。伟大战争的公众形象是一个强壮有力、正直、刚强、镇静的不顾一切的男子汉形象。战争期间男人最主要的品德是:能够忍受战场上触目惊心的污秽、浊臭和可怕的声音,以坚强的心情笑对死亡的威胁。情感的压抑是男子汉理想的基本内容。

起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寻找器质性的病变。因为男人具有先天的精神崩溃免疫力,但逐渐地他们达成了共识,弹震症的原因在战争本身,士兵们对所处的环境的忧郁、紧张、恐惧、厌恶使他们情绪不安,精神崩溃。弹震症是对无法忍受的环境和道德的逃避,是自卫本能、恐惧本能与责任、爱国主义的矛盾,是对战争的否定与逃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弹震症与男性角色的社会期待之间的关系。战争是男性气概的危机时期,是对维多利亚男子汉的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期不允许表现恐惧,引起了战争弹震症,这种对恐惧的压抑,只不过是男性角色期待的夸大表现。恐惧与其它情感表现的压抑也是和平时对男性的期待,士兵、军官已将这种期待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所有身心两方面表现的恐惧、对战争的反抗、和平主义、抗拒、逃避,都被视为软弱、缺乏男子气、女人气的表现。男性沉默、被动、象女人一样表达自己的抗议,成千上万的官兵患上了弹震症,这是对男子气概的更为普遍的、强烈的焦虑,是对女性气的恐惧,甚至是对男子行为的拒绝。

然而,以疾病的方式(以自虐的方式)逃避职责,并不是一种解脱办法,患了弹震症的官兵接受的强电流治疗,女精神病人被施以脑白质切除术和电击疗法,以及其他控制其心灵和精神的管理办法给他们的折磨绝不亚于被当作野兽而被捆绑、被关闭。他们的恐惧绝不亚于战争、死亡。

60年代以来,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心理学家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对疯狂进行了新的研究,认为女性疾病和疯狂既是女性处境的产物,又是对女性角色的逃避,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方式。

伴随着妇女运动,兴起了反精神病学的文化运动,揭示了女性疯狂的真相。因此,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和疯狂之间的文化关联性必须打破。必须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精神病学、心理学领域中妇女的沉默处境。她们从性别角度研究妇女与疯狂的关系问题,超越了弗氏的“性根源”假设、福科对阶级权力因素的重视和对性别

因素的忽视,掀起了对疯狂进行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的又一热潮。

译者

1997年6月于兰州

前言：妇女病

伟大的女权主义理论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生活的最后几年，写了一部小说，这部小说被看作是她的政治性著作《为女权一辩》的姊妹篇。但小说尚未完成，她就于1797年离开了人世。《玛丽，或妇女冤》，描述了“父权法律和风俗惯例对妇女的压抑，使妇女濒临疯狂的绝境”。女主人公玛丽被虐待她的丈夫强行关进疯人院，他要控制她的命运和自由，以便实现他自己的性冒险。对玛丽来说，疯人院，那所“绝望的大厦”，变成了所有将妇女禁闭并使之发疯的人为惯例——从婚姻到法律——的一种象征。玛丽倾听着疯人院其他妇女的哭叫声和歌声，感到自己也失去了理智，然而，她却无法为自己的健康和自由而斗争。她绝望地呼喊：“难道世界不是一所巨大的监狱？难道妇女生来就是奴隶？”^①

有一幅法国画《皮涅尔释放疯子》，描述了同一时期的情况，由托尼·罗伯特·弗洛里所作。这幅画提供了关于妇女、疯狂和监禁之联系的不同侧面。菲利浦·皮涅尔是大革命时期负责管理巴黎疯人院的医生，1793年，他从公社获准释放巴塞勒姆和萨尔皮特里尔的疯子们，为她们打开锁链。这是一次具有政治意味的象征行为，如同释放巴士底狱的犯人一样意义重大。皮涅尔首先为该院的几个男病人打开了锁链，几个星期后，他来到女病人那儿。然而，在描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油画中，罗伯特·弗洛里把“病人”描绘

为不同年龄的疯女人,从年轻的女子到老态龙钟的妇人,有些忧郁地呻吟着,有些则正处在歇斯底里的痉挛中。其中有一位则感恩地吻着皮涅尔的手。画中健康的体现者都是男人。这种女性疯狂与男性理智的区分被画中间的三个形象所强化。站在画前景的是一位衣服散乱的年轻妇女,既可爱,又温顺,双眼谦逊地下垂着,站得笔直的尊严的皮涅尔怀着些许的兴趣注视着她暴露的前胸。看管人正在为她打开链子,同时又擒住她的胳膊,似乎不是在释放她,倒像是将她锁起来。她恰似一个巨大的玩偶。这幅作品表明她那有名无实的自由存在于她与男人的控制的复杂张力中。这幅画可以看作是一种符号:漂亮的女人,她的散乱的身体和紊乱的思想被暴露无遗——被男人审视,这个男人具有释放她的权威。^②

疯狂,既是女人的命运,又是女性的本质,它们在男人科学的理性面前撕去了面纱,这种女性疯狂的双重意象表明了妇女与疯狂间的双向关系。最流行的看法是,疯狂是一种女性疾病,因为得这种病的女人要比男人多得多。对精神病人中妇女人数的增加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有很翔实的记录。^③早在17世纪,理查德·拿破尔医生的病例就表明女病人是男病人的两倍。^④到19世纪中期,病例记录表明,妇女已变成了公立疯人院的大多数。20世纪,妇女仍然是私人诊所和公立精神病院、病人精神健康服务中心和心理治疗所的多数;196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各种数据都表明妇女中间患精神病的要比男人多。”^⑤

但是,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一统计事实呢?一直有人认为,妇女精神疾病率的提高是她们的社会处境,她们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局限性角色以及男性中心的厌女心理对她们的虐待所致。于是,理查德·拿破尔注意到,在他的病人中间,各个阶层的妇女都抱怨婚姻中的痛苦和不幸,对孩子表现出更多的焦虑,对日常生活中的压抑、忧郁和痛苦比男性感受更深。^⑥

然而,迄今为止,更流行的观点仍然是,不考虑统计事实和妇

女的社会状况,在女性气质和疯狂中间划等号。当代女权主义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社会理论家首先注意到,“妇女”与“疯狂”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一致性。她们向我们阐明了,在我们双重的语言和表现体系中,妇女如何被典型地置于非理性、沉默、自然、肉体的一面,而男人却被看作理智、话语、文化、思想的代表。^⑦她们分析并阐述了一种文化传统,即把妇女表现为疯狂,运用女性躯体的形象代表非理性,正如在皮涅尔的油画中一样。象征性的女性精神错乱的名声——阶段与一阶段不同,但表现传统的性别的不平衡却始终不变。于是,疯狂,即使男人得了这种病,也被象征性地、隐喻地表现为妇女病。在法国,一个装扮成女人的男人,被称为“疯女人”,相反,男人,“不仅表现为理智的拥有者,而且也是理智的施与者、分配者,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给与或剥夺别人的理智”。^⑧

如果说妇女与疯狂的文化关联性无处不在,那么,对于当代女权主义者来说,正如对于1797年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一样,疯女人变成一个象征性的形象是不足为怪的。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一书中研究了精神错乱的女人在小说中的形象。她们在19世纪女作家的文本中无处不在,她们是女作家对父权传统之反抗的象征性表现。疯女人是作者的双重性,是她焦虑与愤怒的压抑,正是通过这一双重的暴力,“女作家实现了她逃离男性之家和男性文本的愤怒的欲望”。^⑨那些遭受着更深的精神挫伤的天才妇女,她们的传记和书信已向我们表明:疯狂正是女艺术家在男人统治的文化中为实现其创造性而付出的代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史中,沃吉尼亚·伍尔夫、安娜·塞克斯顿和席尔维亚·普拉斯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姐妹和先行者。

女权主义者对妇女精神病的兴趣已超出了艺术家和作家的范围,也超越了“疯女人是牺牲品”的观点。心理学家,比如费利丝·凯斯勒在她的著作《妇女和疯狂》(1972)中坚持认为,关在美国精

神病院中的妇女对狭义的女性限定进行了失败但英勇的反抗,“是寻求潜力的历程”。她们的病是性别准则的一种符号,是对这种准则进行反抗的标志,是对“作为女人想不是和敢不是的惩罚”。^⑨法国女权主义理论把对疯女人的这一界定发挥到了极致,对海伦·西苏和夏威尔·戈底耶这些作家来说,疯狂已成为女性抗议和革命的历史标签,她们肯定19世纪末“令人钦佩的歇斯底里患者”,特别是弗洛伊德著名的病人“杜拉”,她被看作是捍卫女性气的先锋,她在身体症状和语符中表现的对抗,颠覆了男性科学的线性逻辑。^⑩

当然,在19世纪特殊的历史框架中,歇斯底里,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女权主义抗议的无意识形式,是当时妇女运动对父权价值进行进攻的另一种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的杜拉是易卜生娜拉沉默的姐妹;她们都抗议社会把她们界定为资产阶级家庭中的玩偶。但这种认识有可能将疯狂浪漫化,或者将它当作渴望反叛的形式,而不是把它看作无权者绝望的表现。正如肖珊娜·弗尔曼所说:“疯狂绝非反抗,它是困扰那些被文化环境剥夺了自信心和抗议能力的妇女们的绝境。”^⑪要对妇女疾病进行严肃的历史研究,就不应把疯狂浪漫化为妇女的一种冤屈,而应该接受妇女与疯狂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这一事实;更应该研究在特殊文化环境中性别观念如何影响精神紊乱的确定和治疗。

这本书既是一部女权主义的疯狂史,又是一部视疯狂为妇女病的文化史。我研究了两百年来英国精神病学领域对女性精神病的发现与治疗,探讨了妇女首先被界定为“疯了”,然后将其监禁的社会医学语境。我也考察了在法律、医学、文学文本及绘画、摄影和电影中疯女人的表现。这些形象不是简单的对科学、医学知识的反映,而是构成女性和疯狂之观念的基本文化框架的一部分。如果浏览一下科学文献特别是十九世纪精神病医学语言的话,那么,如同小说的语言,大多数都充满了假定,都是被文化决定并以文化的隐

喻来表现的。以往精神病学的历史学者很少注意性别的问题,心理学史材料的常规来源,比如医学杂志、心理学课本、疯人院记录、议会法案、法院案例、报刊描述都无视沉默的妇女的声音。即使最激进的心理学家批评家也把阶级因素而不是性别因素看作个人心理历程和社会心理惯例的决定因素。虽然有人在福科影响下写了疯狂的历史,但福科在《癫狂与文明》(1961)中对权利的批评也未考虑到性别。当他揭露了疯人院改革背后的压抑观念时,福科并没有探讨疯人院使之沉默和监禁的非理性和差异性仍是女性化的。

为了弥补疯狂史研究中遗失的性别分析和女权主义批评,我们必须求助不同的文化根源,如同院病人的叙述、日记、妇女回忆录和小说,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到玛丽·班恩斯,这些女性的叙述,以及那些在心理学事业的发展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妇女的写作所提供的另一类材料来源,提出了关于诊断、治疗妇女病理论的观点,这些观点不同于以往那些心理学话语之主体的观点。与其说他们是理论家和心理学的创造者,还不如说是话语的主体。

我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民族语境——英格兰语境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泛泛地对疯狂与女性气之间的关系予以界定。虽然英国关于疯狂的观念也被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认同,然而,共同的理论在不同的民族语境中有不同的结果。19世纪30年代以来,英、美、法、德诸国的心理学家就有着活跃的思想及学术交流,他们相互访问疯人院,热切地阅读相互间的出版物,但到19世纪末,当各个国家确立自己的道德、医学、心理学界限时,精神病学的态度和政策则不尽相同;同样,对性差异和女性的态度也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意义。

更主要的是,英国具有研究疯狂的丰富材料,因为在这里有着一种经久不衰的、延绵不断的、充满幻想的疯狂英国的文化观念。18世纪以来,“英国病”和诸如商业、文化、气候、烹调,这些民族体验诸方面的关系一直就是科学论文和文学文本的主题。^⑫长期以

来,英国人怀着一种既自鸣得意而又悲哀伤感的心情,把他们的国家看作是一个全球性的疯狂大本营。在《古代英诗的遗风》中,波西说,英国比她的任何一个邻国都拥有更多的“疯狂之歌”(mad songs),从1247年巴塞勒姆医院创立以来,它就成了所有疯人院的象征,正如巴士底狱在监狱史上的地位那样,它在疯人院的历史上也有着不可想象的地位。奈德·沃德的喜剧《全都疯了,英格兰;一所巨大的疯人院》(1711)是把愚蠢、古怪、忧郁描述为英国民族性格的文学传统的一个典型。但在1733年,社会医生乔治·切尼在一部题为《英国病》的书中却说:疯狂是英国感伤、野心和知识的副产品。他号召读者应为他们民族遗产的一部分——阴郁、疑病症和坏脾气而自豪,因为这些神经质的苦恼是进步和文化优越的标志。他解释说,“我们有更多的神经疾病,因为在所有真实的艺术、研究、发明、学术和所有以沉思冥想及案牍生活为特点的职业中,现代人都在为能超越前代人而拼搏”。^④

抛开医学不论,就大众通俗文化的层面上看,疯狂与英国的联系一直是极为紧密的。自从60年代R. D. 莱恩领导的反精神病医学运动以来,把英国病当作民族性格之组成部分的看法又被注入了新的活力。1977年当我告诉海斯鲁机场的海关关员我要研究疯狂问题时,他非常肯定地对我说:你来对了地方。

更有意义的是,在英国,对男女两性疯狂的认识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19世纪心理学在描述英国病的同时,描述了妇女病。当男女有相似的精神紊乱的症状时,心理学家把英国病(男人疾病)与妇女病相区别,把前者与高度文明的人所受的经济和知识压力相联系,而把妇女病与性及妇女的本质联系起来。他们相信,女人比男人更易于发疯,而且妇女以特殊的女性方式体验疯狂。这种病对她们的生活行为的影响也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病学家亨利·莫兹利坚持认为,严重的痴呆也受到女性品性的限制;妇女不会象男人那样能“具有如此活跃的能量和亢奋的激情,她们较为安

静,较少进攻性,沉迷在对她们温柔的本性和静谧的生活之流及生存环境的满足之中。”^⑤

18世纪末,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这时,对疯狂的看法和疗法都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变。先前,疯子被看作是没有感情的畜生,凶猛的动物,需要用链子、鞭子、紧身衣、带栅栏的窗户和上锁的地下室加以防范。现在则被看作有病的人类和值得怜悯的对象;她们会在精心的照顾下恢复健康。这种观念上的改变被称为第一次精神病学革命,紧接着,英国的社会改革家,包括法官、富有的慈善家、非专业性的治疗医生,都开始调查研究私人疯人院、救贫院和监狱中对待疯狂的主要方法,并开始创立一种新的机构——精神病院。在这里,父母的衣食供给和宗教信仰代替了肉体的压制、恐惧和暴力。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以特殊的性别意义为基础的理智与非理智的区分,精神病人的象征性性别从男性转向女性。如果说对于安妮女王时代的人们来说,疯狂的文化形象是男性,那么,在18世纪中期,对疯狂最著名的表现是巴塞勒姆医院门口和莫弗尔德门口两座带镣铐的男性裸体雕像。它们是凯乌斯·盖布里尔·希伯尔的作品。^⑥正如波普在《笨伯》中所说,这两位愚钝的黄铜兄弟分别表现了“忧郁的疯狂”和“愤怒的疯狂”,标志着疯子走进了精神病的“阴间”。^⑦然而,在这一世纪之内,迷人的疯女人逐渐代替了令人厌恶的男疯子,她们既是被监禁的疯子的原型,又是一种文化肖像。精神病改革运动的直接原因是疯人院对弱女子的非人待遇。比如,1793年,魁克的一位年轻寡妇在约克精神病院神秘而恶劣的环境下死去,魁克愤怒的慈善家们支持当地慈善机构的一位商人威廉·图克建立了约克康复医院。这是首先对疯病给以人道待遇的精神病院。^⑧但以后的几十年中,仍不时暴露女病人被疯入院的看管侮辱、强奸甚至谋杀的事件。这些曝光进一步改变了流行的观点。当公众被说服疯子是需用暴力进行管束的低人

一等的造物时,这些对侮辱虚弱妇女的报道却激起了公愤和意识的改变,这又导致了一系列法律的改革。

的确,疯狂与女性的非人待遇之间的联系成了当时主要的一种文学虚构惯例。笛福曾抗议把疯女人做交易,揭露并批判男性和疯人院管理人合谋将好惹麻烦的妻子和女儿除掉的阴谋。19世纪晚期的小说家把疯女人描写成父母专制和男性压抑的牺牲品,一种引起感伤情调的对象;于是,亨利·迈肯兹这位“富于情感的男人”为了他在疯人院里看到的一个疯女人而哀声叹气。^①

到了1815年,希伯尔的男性雕像已从公众的视野中隐退到幕后。掩盖它们的帷幕只有在特殊的要求下才能被拉到一边。^②这些令人不安的狂野、黝黑、裸体的男性形象被年轻美丽的疯女人那诗意的、艺术的、戏剧性的形象所取代。这种牺牲品化的疯女人几乎成了令浪漫作家着迷的形象。乔治·底埃尔的十四行诗《写在疯人院:与一位年轻美丽的疯女人相遇》(1801),就是这时期的一篇典型之作。它表现了诗人看到“甜蜜的女士”时被一种怜悯所征服——她那“天使般的脸”和“温柔的胸”使她的疯狂显得更加迷人。^③然而,这温柔的女性非理性,对男性的理智却有如此的征服力,或许表现了女性疯狂不可驯服、不可知晓的性力量。女性疯狂那种困扰人的多重本质,通过三个浪漫的疯女人的形象——自杀的奥菲莉亚、感伤的疯子简和凶猛的露西亚——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并使之魅力永存。这三个形象将女性的性特征及女性本质确定为女性疾病的根源,但每一个形象都代表着对女性疯狂及其与男性关系的不同解释。

所有这些形象都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的人物奥菲莉亚。拉埃特斯称她为“疯狂的明证”。的确,正如桑德·吉尔曼指出的:几个世纪以来,奥菲莉亚的不同表现可以看作是一种女性疯狂之界定的变化史:从伊丽莎白时代的色情病、19世纪的歇斯底里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乱伦冲突以及莱恩精神分裂者的双重束缚。^④

与角色相关的舞台惯例总是强调奥菲莉亚疯狂的女性本质,与哈姆莱特普遍化的、充满隐喻的忧伤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上,奥菲莉亚总是穿着白色的长裙,装饰着野花编成的奇异的花环,披散着头发,吟唱着忧郁的色情的民歌;她的语言表现出夸张的隐喻,抒情诗般的自由联想和明显的性意味,也表现了所有古典式的爱情忧郁症。

所有这些表现都传达了有关女性和疯狂的双重信息。这个披散着头发的女郎表现出一种不体面,一种不适当的色情。^⑤奥菲莉亚的花也来自文艺复兴妇女性别特征的肖像画,奥菲莉亚对它们的展示是对自己象征性的“蹂躏”,^⑥甚至她的淹死也把女性和非理性联系了起来,因为水是妇女之流体——经血、乳汁、眼泪的有机象征^⑦。

鼎盛时代的作家们对奥菲莉亚角色中的色情和不协调因素深感不满。同萨缪尔·约翰逊一样,他们把她看作无辜的牺牲品,年轻、漂亮、无害而虔诚。这一时代的人们对奥菲莉亚那轻浮和粗鄙得令人震惊的言语表示不满,致使这个角色受到审查,她的独白被删除,并把这个角色指派给一位歌手而不是一个女演员来扮演。另一方面,浪漫主义者却对奥菲莉亚的性感与情感着了迷。19世纪30年代,爱尔兰演员哈里耶特·史密森在巴黎再次塑造了奥菲莉亚的形象。对这个世纪的艺术家的来说,奥菲莉亚变成了一个摆脱不了的形象。在她的疯狂的场景中,哈里耶特戴着长长的黑面纱,这是笼罩在哥特式小说中的女性神秘象征。她头发上粘着疯人院里疯子头上常有的稻草,她的形象在通俗肖像画中被广泛模仿,法国的时髦女士们模仿她,年轻的海克特·伯利欧兹如此神魂颠倒,以致与哈里耶特结了婚,德拉西罗克斯在他的许多具有浓厚性意味的女性画中,都把她们画成了奥菲莉亚。^⑧

在浪漫的想象中,奥菲莉亚有两个重要的附属形象,每一个形象体现着她性格的一面。流行的是疯子简(有时被称为疯子凯特或

疯子安),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仆,被她的情人抛弃了,或者说,他的死使她失去了他。这原先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民谣,最早由哥特式小说家“修士”马修·刘易斯于1793年所写,很快就出现了描写疯子简死亡与幽灵的情节剧、系列剧和萨拉·威尔金森沿街叫卖的小故事书《简·阿诺德小姐的悲剧史,通常被称为疯子简、亨利·波西沃尔先生及其出生、父母、求爱及忧郁结局的叙述,根据事实写成》(1813)。疯子简是一个驯服的无害的疯女人。她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生命耗费在思念她失去的情人上面;“她在那些她曾与亨利散过步的地方逛游,她用最坦率的方式歌唱着,与那些能与她谈论她情人的人说话。她把柳枝和野花插在头上,既奇异又古怪,这似乎是唯一可以抚平她创伤的方法。”^⑨疯子简的吸引力是不难推测的。什么是更女性气、更受尊敬、对负心的男人和强大的父母更少威胁的行为呢?对浪漫主义作家来说,疯子简是一个感人的形象,她体现了女人的脆弱,使人想起被男人的影响所左右的女性谄媚者,象托马斯·贝克和乔治·谢费尔德这些浪漫主义艺术家都把简描绘为暴风雨中一个忧郁的孤儿。^⑩

文化意象与精神病学观念交流融汇,表现简的形象甚至进入当时的精神病学教科书。19世纪20年代,亚力山大·莫里森博士,在法国精神病学家艾斯奎罗尔关于法相术的著作的影响下,邀请艺术家参观了萨里郡的疯人院。亚力山大·莫里森是这儿女病人科的负责人。他在一系列关于精神病人相貌的演讲中运用了病人的肖像画。许多画其实是以疯子简的风格标准化了的,即使当她们被描述为狂躁的疯子时,这些女人也有着甜甜的微笑,可爱的姿态;她们戴着精致的女帽,头饰如同女士年鉴中的样式。比如,A. A.小姐就是一个“色情狂”,她也是一个女仆,却对她教区的牧师产生了激情。她总是被描述为随时准备与人接吻的样子。^⑪疯子简已成了19世纪疯人院的典型居民,她不仅被作为疯女人形象的典型,而且也是男性疯狂的范例。50年代,一位名叫理查德·达德的

艺术家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在疯人院度过了大半生,他正是按照疯女人简的形象为他同院的一个男病人画了一幅肖像画,它穿着疯女人打了补丁的长袍,头上戴着野花,粘着皮条和破布,插着稻草。

当感伤之风达到高潮之时,疯子简的传奇也经历了一种阴暗的变形。如果疯子简是无害的,那么,她的同伴露西,却表现了女性对男性的疯狂的暴力行为。这个形象来自司格特的小说《拉莫莫尔的新娘》(1819)。女主人公露西·阿什顿被迫与所爱的人分离,不得不遵守更为社会所接受的婚姻。但在她结婚的晚上,客人们听见从洞房里传来了尖叫声,他们冲进室内,发现新郎被刺伤在门槛上,露西缩在角落里,“她的头发散乱着,睡衣被撕破了,粘满了血迹。她双眼凝滞,姿势就象一个狂野的疯子。当她看到自己被人发现时,便发出急促而莫名其妙的声音,她张大嘴,以一种狂喜的疯狂的态度,用她那粘着血迹的手指着来人,……当他们抬着她经过门槛时,她俯视着受害者,还喃喃着她唯一清晰的话:‘……所以,你杀死了你美丽的新郎’”^⑫。

妇女逃出了女性的束缚,但却又掉进疯狂的陷阱之中,这是19世纪浪漫歌剧一个普遍的主题;司格特的小说主题受到八部歌剧的影响,包括多尼扎特的《拉莫莫尔的露西亚》和一个接一个的疯狂场景中的女高音。^⑬据说,这些歌剧的流行表明了观众中存在着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女权主义同情心;女性歌剧爱好者能够与被男性支配的贵妇人“忧郁、绝境、自杀和谋杀以及高声的愤怒”这类体验产生共鸣。^⑭福楼拜将这种共鸣具体化,他让他的女主人公爱玛·包法利与外省人的作品《拉莫莫尔的露西亚》中凶猛的女主人公认同,爱玛问自己,“噢”,“她为什么不象这个妇女那样反抗呢”?^⑮但观看这些歌剧的演出使人们认识到,即使杀人的疯女人也不能逃脱男性的统治;她们通过假设一种纯洁女性的、理想化的诗意形式逃避了一种对女性冤屈的特殊的难以容忍的再现。而这种诗意的形式正是男性文化所界定的;完全的非理性、绝对的情感

化,而且一旦采取了什么单独的行动,那也是绝对的被动行为。

这些女性疯狂的形象来自于一种文化语境,这种语境既不可能被列成精神健康的统计表,也不能转化成统计数字。通过精神病学解释这一中介的分析和具体化,它们已不再是男性文化所讲述的关于女性疾病的故事了,就象皮涅尔释放疯子的油画,它们具有控制和掌握女性差异本身的作用。

随着19世纪的进程,英国的精神病治疗和英国文化编造了有关妇女病的新故事,但其主题在本质上仍是一致的。我通过考察英国精神病医学的三个历史阶段研究了这些主题:维多利亚精神病学(1830—1870),达尔文派精神病学(1870—1920)和现代派精神病学(1920—1980)。^⑨这些阶段的术语表明了主要的文化和文学时期与它们所形成的精神病学观点之间的连续性。维多利亚时期的到来伴随着社会对精神病的反应以及对女性的界定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新的法案使公立精神病院成为治疗精神病的主要机构。1845年的精神病人法案首次要求所有各郡及英格兰、威尔士的主要城市必须为照顾精神病人做好准备,这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精神病院建设时期,在两年之内,五十三个郡中有三十六个建立了公立精神病院。这个世纪,随着公立精神病院数量的增加,女精神病人的百分率也提高了;到了19世纪50年代,女病人已成了病人的绝大部分,精神病院而不是阁楼被认为是最适合疯女人的地方。与他们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肯定相一致,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家庭化的精神病机构能够驯服疯狂,使之家庭化,并将它带入理性的领域。他们设计精神病院不仅是给非理性的女性居住,而且也要通过父母般的治疗和管理技术使之痊愈。在维多利亚的精神病院,疯子通过日常生活、空间的安排和室外活动得到安全的管理和控制。

然而,1870年以后,精神病院已明显不能实现其创办者的初衷。过度拥挤,资金不足,人员太少,使得维多利亚驯化疯狂的技术变得纯粹的名不副实。伴随着达尔文遗传、进化和退化理论,很快

就出现了达尔文主义的疯狂观。它把精神病看作是机能欠缺、遗传低下和邪恶环境的产物,把精神病人看作是虚弱退化的人,他们的病是先天的。达尔文派的治疗医生怀疑精神病院的照顾和父母式的治疗法的效果;相反,他们对自己的作用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他们是心理警察,在健康和疯狂的疆界里巡逻,保护社会免受这类退化的人种危险冲动的侵害。

这些医生的戒备心理不仅扩展到了那些出身低下和精神虚弱的人上,而且也延及到了妇女。在1870—1910年的几十年间,中产阶级的妇女们开始组织起来,要求更高的教育、就业和政治权利。与此同时,女性厌食症、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等神经紊乱疾病十分流行;而达尔文派的“神经专家”起而支配精神病院内外合适的女性行为,对不同阶层的“神经质”妇女采用不同的治疗,反对妇女改变她们生活环境的努力。

19世纪末,歇斯底里,这个古老的女性疾病变成了心理学第二次革命的焦点,精神分析产生了。^⑩正是对歇斯底里的妇女的研究使弗洛伊德首先形成了神经紊乱来源于性的理论和梦的解析方法及自由联想法。然而,心理学向现代主义的转变并非发生在著名的女性歇斯底里患者的全盛期,而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患了弹震症的士兵——男性歇斯底里患者——急需治疗,使达尔文派的方法从理论到治疗都以失败告终。为了治疗弹震症,心理学家不得不试验各种新的治疗方法,包括暴露无意识冲突和压抑的精神分析方法。正是男性疾病而不是妇女疾病导致了这种转变的可能。虽然传统的妇女歇斯底里的发生在战后有所减少,但新的女性病——疑症病,很快代替了它的地位。在现代艺术和文学中,患疑症病的妇女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异化和破碎不堪。在治疗疑症病并且在英国先于精神分析的心理医学中,妇女是接受电击疗法、心理外科手术和药物治疗的主要病人。

在这种精神病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它的主要观点受到社会

大变动时期对心理学思想挑战的影响,同时这些观点也受到那些个体医生职业的影响,他们不仅支配着同时代人的思想,而且改变精神病医生的社会角色,以便使它符合时代的文化理想。比如维多利亚早期的约翰·康诺利,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亨利·莫兹利,一战期间的W. H. R. 里弗斯和本世纪60年代的R. D. 莱恩,就是这样一些有影响的支配性人物。在英国文化的两个多世纪中,他们的生活和观点为每一阶段对女性精神病的讨论以及生病、诊断、治疗和表现的方式确定了精神病学的语境。

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物都是男性。文化时尚、精神病学理论和公众政策的改变都没有转变使疯狂成为一种女性疾病的性别与权利的不平衡。尽管心理疗法已被广泛接受,但现代派精神病学尚未在女性疯狂的文化结构中引起意义重大的改变。在英国精神分析领域中,几位女性先锋人物的出现也并未对弗洛伊德的女性性心理观念有什么修正;精神分析,由于它强调阴茎嫉妒为女性性心理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也没有提出一种更为广阔的关于妇女和疯狂的革命性话语。最令人失望的是,即使60年代抗议电击疗法,提出分析妇女的家庭、社会处境的反精神病学运动,不仅其理论上的努力归于失败,而且,它的实践也是最具性别歧视的。

然而,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已经在女权主义心理学家的著作和治疗运动中,看到了第三次精神病学革命的开端。这些理论和实践都坚持“妇女”和“疯狂”之间的文化联系必须摧毁,“女性气”不应以男性标准的术语界定。然而,如果何谓正常何谓反常这些概念仍然由男性来定义,而且妇女还必须接受这些概念,那么,打破“妇女”与“疯狂”的必然联系,重新界定“女性气”就是一纸空谈。本书的目的,在于推动心理学、精神病学历史上的女权主义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为妇女而言说,而且也允许妇女为自己而言说。

注释:

①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玛丽,或妇女冤》(纽约:W. W. Norton) P21,23,27。

②油画讨论见桑德尔·L·吉尔曼《关于疯狂:精神病解释的文化史》(纽约:Brunner-Mazel,1982),P212-213。十九世纪科学与医学中的妇女表现,见卢德米勒·乔丹弗的论文《自然事实:一个关于科学与性别的历史视角》,收入《自然、文化与性别》(卡洛尔·迈克考麦克·玛丽琳·斯特拉森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P54。

③理论及数据研究,见《妇女与精神健康》,伊力莎白·豪威尔,麦丘利·巴耶斯主编(纽约:Basic Books,1987)。其他资料见约翰·阿彻和巴巴拉·劳埃德的《性与性别》(Harmondsworth:企鹅出版社,1982)。

④迈克尔·麦克唐那《神秘的疯人院:十七世纪英国的疯狂、焦虑及其治愈》(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P36-40。

⑤参见沃特·戈夫·和J·F·托德《成年性角色和精神疾病》,见《美国社会学杂志》(78期,1973年),转引自豪威尔·巴耶斯《妇女与精神健康》P155。

⑥麦克唐那《神秘的疯人院》P74。

⑦参见肖珊娜·弗尔曼《妇女与疯狂》,见《发符号学》第5期(1975)P2-10;吉纳维夫·劳埃德《理智的人:西方哲学中的“男性”和“女性”》(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p1-17。

⑧弗尔曼《妇女与疯狂》第7页。

⑨桑德拉·M·吉尔伯特·苏珊·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十九世纪的文学想象》(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P85。

⑩费利丝·凯斯勒《妇女和疯狂》(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2),P31,16。

⑪参见《杜拉病例:弗洛伊德、癔症、女权主义》,查尔斯·伯恩海莫和克莱尔·卡亨主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5),P1-32。

⑫弗尔曼《妇女与疯狂》P2,“歇斯底里的历史语境”,参见朱丽叶·迈克尔《妇女:漫长的革命》(纽约:万神出版社,1984)P115-124。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前言:妇女病	(1)
第一章 驯化疯狂:约翰·康诺利与精神控制	(1)
第二章✓ 维多利亚时期疯女人的涌现	(32)
第三章✓ 控制妇女的心灵	(59)
第四章 边缘地带:亨利·莫兹利与达尔文主义.....	(80)
第五章 神经质的妇女:性角色与病角色	(103)
第六章✓ 女权主义与歇斯底里:女儿的病	(132)
第七章 男性歇斯底里:W. D. R. 里弗斯与弹震症的 教训	(151)
第八章 妇女与现代主义精神病学	(182)
第九章 妇女、疯狂与家庭:R. D. 莱恩与反精神病学 文化	(211)
后记:疯狂与妇女的权利	(241)